

黄旭华：默默无闻的“中国核潜艇之父”

今年87岁的黄旭华院士,在默默奋斗了近半个世纪后,首次进入公众视野。他的事迹感动了中国,在中华大地上口口相传。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立志为祖国“上天入海”

黄旭华是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人,祖辈大多从医,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希望他未来能够从医。为什么后来学起了造船?黄老后来回忆,“那时日本人人侵,我们被迫离开华南沿海家乡,往内陆转移。轰炸一来,必须躲到掩体中。那时我就想,要么上天,要么入海。”1945年,黄旭华考取了交大的造船系。

投入核潜艇研究,则是上世纪50年代了。1958年,聂荣臻元帅向党中央请示,上核潜艇,很快获批。因为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黄旭华被选中参研。那时,对核潜艇的研究极为保密,黄旭华不得不远离父母家人。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只身来到风暴经常光顾的试验基地。后来,他们干脆把家也搬到了荒凉的小岛。

此后30多年,他的父母、8个兄弟姐妹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才陆续跟家人联系,但父亲临终时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母亲从63岁盼到93岁才见到他一面。

从一个玩具模型开始铸造共和国“水下核盾”

核潜艇,被称为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和



2月11日,“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颁奖典礼揭晓,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榜上有名。

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是从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开始的。当时,核潜艇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黄旭华选择了难度很大但却是最先进的水滴线型。为确定可行性,他和同事们在实验室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为了艇上千万台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黄旭华要联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那时,又没有计算机,黄旭华和同事们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了成千上万个数据。

经过黄旭华与团队的艰苦科研,1964年,我国第一艘

核动力潜艇研制成功;1970年试航;1974年交付海军。1981年中国第一艘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中国成为继美、苏(今俄)、英、法之后,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62岁亲自深潜试验妻子闻讯放声大哭

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这是举世公认的危险试验。世界上曾有10多艘核潜艇在进行试验或航行时沉没了。1960年代,美国的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做深潜试验,还不到200米,潜艇上129人就全部葬身海底。已经62岁的黄旭华亲自下潜,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再一次检查每一台设备,每一块钢板,每一条焊缝,每一根管道,确认万无一失后,核潜艇开始下潜。100米、200米、250米、300米,巨大的水压使艇身多处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黄旭华镇定自若,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平安上来后,他诗兴大发,现场作诗曰:“花甲痴翁,自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当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到黄老家中,一向默默支撑着家庭重担的妻子放声大哭……

正是这一年,我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进行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国家

《湖北日报》2014.2.11文/蒋绶春 文俊

不堪重负的城市“老啃族”

与让人嗤之以鼻却又暗带几分羡慕的“啃老族”不同,“老啃族”,准确描述着如今众多出身农村的“80后”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背负着历史对父母的亏欠、农村“泛家族关系”带来的沉重人情负担,他们犹如生活在一个漩涡当中,长时间被动打转,很难爬上来,却容易沉下去。

建房之困

2014年1月5日,在广州工作的广西玉林人罗峰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向妻子“坦白一切”。

一个多星期前,他接到了家里的电话。父亲说,想在村里建一栋楼房。在小山村,他家还住着一幢时常漏水的泥砖瓦房。

人工由亲戚朋友赞助,剩下的费用,大约需要10余万元。罗峰有1个哥哥,2个姐姐,但他们都在乡下务农,日常还需罗峰接济。父亲的意思是,由罗峰负责10万元。

父母年迈,对这一要求,罗峰无法拒绝。他并不富裕,女儿刚出生,正是用钱时。将所有的存款搜罗起来,也不过区区数万元在手。罗峰答应父亲,将在2014年年底拿出这笔钱。

他心里盘算:现在户头上有1万多元公积金,加上2014年全年的公积金,又有1万多元,自己月入在七八千元,收入一分不花,算下来正好够数。但这意味着,全年的家庭开支,就都压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妻子每月收入6000元左右,勉强能够承担。

只是,怎样向妻子开口,让他为难,彷徨多日未能启齿。

作为一个依靠读书从农村挣脱进入城市生活的“80后”,工作已经9年,他依然无法清楚地界定自己的身份。“我是

一个城里人还是一个农村人?”这是一个百思无解的问题。户口放入了广州的人才市场,人在广州的企业上班,从城市人口的统计角度看,自己无疑是城市人口。然而身为第一代走出农村的家族成员,他的主要的亲属关系、亲缘环境都还稳稳地坐落在老家,“大家”仍在农村。农村对他的“索取”仍牢牢地将他锁住。

罗峰的境遇不是孤例,而是出自农村的“城一代”们面临的普遍困境。

做城市的人,操农村的心,人在城市,但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因为有“父母老矣”、“老无所养”的心理恐慌,在物质压力面前动弹不得,人生也显得狭隘。

偿债者们

同是“80后”的周玲,一看到手机显示家里拨来的电话就会很害怕。

家里来电话,无非两件事:一是要钱;二是出事了。要钱都还好说,自己没钱可以借,就怕出大事(比如一场大病,或者意外的灾祸),多年来勉强维系着的生活就会崩溃。

她是湖南浏阳人,在深圳工作,每月领4000元左右的工资。工资的使用分配如下:房租、伙食费、电话费加起来每月1500元,寄给父母1000元生活费,给还在上大学的弟弟1000元生活费。剩下500元,不买衣服、也没有朋友聚餐的情况下能存下来,否则就会月光。

“老啃族”的困顿与无奈,在周玲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有时父母或者弟弟来电,要求临时追加一些钱,要么是看病,要么是凑份子参加村里的筑路、修桥、建祠堂,或者购买额外的生活用品,她的生活就会陷入窘迫,有时会急得暗自哭泣。

过去数十年,农村社会保障缺失。大

部分的农村“80后”的父母,过着飘摇的自生自灭的生活,社会保障对于他们而言几乎等同于外星词汇,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子女。在子女成长起来之后,过往的体制性问题造成的历史空白,必须由子女去填补和负担。

“老啃族”除了力尽所能地养着父母,还面对着许多乡村社会通过父母传递过来的额外负担。前述的筑路、修桥、建祠堂是一部分,此外还有农村的泛家族关系带来的人情负担。

比如表弟上大学要赞助一点费用、姑舅新居入伙要赠送一台电视机、父亲的朋友做大寿要送个贺礼……这些人情债,最终还是都落实到子女身上,成为“养老负担”的一部分。

长期缺乏保障,子女就是唯一的保障。谁家有一个在城市里有一份像模像样的工作的子女,就是家里最大的骄傲。

“有时候回到家里,根本跟我没有关系的场合,父亲也要找机会来介绍我一番。”罗峰说:“七八千元收入,在他们眼里是一个高得离谱的数字。”

“但紧跟而来的就是各种麻烦,有人来向你借钱,或者找你办事。借吧,没钱,对方借了基本也不打算还;办吧,没那个能力,你如果拒绝,在乡下就会迅速形成一个让家里人十分难受的负面舆论场。”

在城市里,你会在物质上尽量低调,有时还会做一些必要的隐匿,然而在农村,是另一套令人头大的逻辑。在城市的孩子努力去供给在农村的家庭,这几乎就是城市“反哺”农村的唯一形式,然而实质上,这还是农村的“自哺”。

《南风窗》2014.3.1文/李淳风

毛泽东不乘飞机的真实原因

有关毛泽东不乘飞机的原因,说法比较多的是:毛泽东曾乘坐飞机空中遭遇雷电,与地面失去联系40分钟。但曾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谢静宜说,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毛泽东乘坐的飞机失踪40分钟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提出要去广州视察。为了节省路途上的时间,他坚持广州一行要乘坐飞机——而且是由我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

5月3日,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武汉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毛泽东在广州停留近一个月。

6月4日,毛主席在上午畅游长江之后,下午就乘飞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回北京。不料,途经河北衡水附近上空时,飞机遭遇雷雨云阻断航路。雷雨云是垂直发展达数千米的云层。飞机一旦误入这样的云层,就会受到强烈的扰动和遭受冰雹与雷电的袭击。

8205号的空勤组经过研究后,果断地改变计划的航向,首先飞向天气比较稳定的沧州机场上空,躲开雷雨云后,再改向北飞,回到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在绕云飞行的过程中,约有40分钟的时间,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地面雷达也无法找到空中的飞机。这时,在西郊机场迎接的中央首长和在指挥塔台守候的刘亚楼以及所有在场人员都焦虑万分。失踪的飞机终于出现在西郊机场上空,缓缓降落。

当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卷,从容走下飞机的时候,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乘火车想停就停,想走就走

有人说,正是因为1956年的那次“空中历险”,中央政治局才严格控制毛泽东乘坐飞机。外出考察,一般不允许他坐飞机,一律改乘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这些传说,都不符合历史事实。谢静宜解开了这个历史谜团:“有一次,主席曾对我谈到此事,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下车去看看,或者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

这就是毛泽东不乘飞机的真实原因,既符合毛泽东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的思想,也符合他个人的性格。

从安全角度来看,坐火车并非绝对安全,或许给敌人以行刺机会。但毛泽东总是不以为然。毛泽东一生富有挑战精神,不信邪,不怕死,一切是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出发,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

《党史文苑》文/李光彩

抗战中牺牲的4位中国奥运选手

1936年,第11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处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夜的中国派出了有69名运动员的代表团参加了这届奥运会。已在国民党第32军服役的王润兰凭借自己出色的拳击功底,在参奥选拔中被选入了只有4个人的拳击项目代表队。在决定比赛决赛权的最后一场和英国选手的对打中,王润兰以2比1取胜,获得了拳击赛的决赛权。意想不到的是,三天后决赛即将开始时,中国代表团领队竟突然接到奥运会组委会的通知,说王润兰在预赛时已被裁判组判定失败,不能参加最后的决赛。就这样,由于组委会一些人出于

对贫弱落后中国的歧视和某些政治的需要,公然颠倒黑白,在众目睽睽之下剥夺了中国运动员的决赛权!

中国奥运参赛代表团回到祖国后不久,1937年8月,日军集中第十四师团、二十八旅团和6个步兵大队,总兵力约6万人,分三路向漳河北岸进击。9月14日,为掩护主力部队向新战场转移,王润兰所在的补三团部队奉命在漳河阻击来犯之敌。全体参战官兵连续奋战4昼夜,部队损失惨重,人员伤亡过半。9月21日拂晓,当数辆日军坦克再次攻上阵地时,身负重伤的王润兰以最后的气力奋力跃起,抱着集束手榴弹和几名身绑炸

药的战士一起扑向敌人的坦克,随着一阵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王润兰等年轻的生命在血与火中得到了永生。

据史料记载,当年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不少选手也像王润兰一样,他们在回国后不久便以中国军人的身份英勇抗敌,为抗击日寇的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当中有进入复赛的撑竿跳高运动员符保,他在1938年武汉保卫战的一次对日空战中献出了年仅24岁的生命。另外两名奥运拳击选手靳贵第和靳桂,分别在1937年的安阳保卫战和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中壮烈殉国。

《老年生活报》2014.3.14文/郝晋